



全译本

新教伦理与 资本主义精神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德] 马克斯·韦伯 著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Spirit of Capital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Spirit of Capitalism

Spirit of Capital

全译本

[德] 马克斯·韦伯 著

新教伦理与 资本主义精神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Max Webe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韦伯著; 龙婧译.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7

ISBN 978-7-80080-666-7

I. 新… II. ①韦… ②龙… III. 新教—研究—西方国家 IV. B97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8811 号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出版人 范芳

责任编辑 陈丹丹

出版者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地址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邮政编码 100006

网站 www.qypublish.com

电子信箱 qunyancbs@dem-league.org.cn

联系电话 010-65263345 65265404

总经 销 群言出版社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

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

封面设计 大象工作室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1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080-666-7

定 价 29.8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宗教的派别和社会的分层 19

第二章 资本主义精神 31

第三章 路德的“职业”观念 61

第四章 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76

第五章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142

注 释 175

后 记 252

Max Weber



导 论

任何一个浸淫于欧洲近代文明的人，在研究那些现代历史的问题时，都不免会抚躬自问：那些仅在西方文明中显现出来的典型的文化现象——就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产生于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发展中的现象，究竟是哪些事件的合力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呢？

科学也只有在西方才能经历这样一个发展时期，使得当代的人们公认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而知识经验的总结，对无限宇宙和生命存在的思索，以及对高深的哲学和神秘的神学敏锐的洞见，都未包括在科学的范畴之内。（一项成熟神学的发展总要归功于希腊文化下的基督教的影响，而伊斯兰教与几个印度教派中都不存在这种成熟的神学。）简而言之，堪称精髓的知识和观察在别的地区也都存在，特别是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这几个国家；然而，埃及或别的什



马克斯·韦伯

么地方的天文学并不具有古希腊人所获得的那种数学基础(这也令这些地区的天文学更为发达);印度的几何学,甚至根本没有推理的证明,而这正是希腊文明的另一种产物,现代力学与物理学的发展也源于此:虽然印度的自然科学长于实物观察,却缺乏实证的方法——若避开远古时代的源头不谈,这种实证论就如同近代的实验室一般,差不多都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品;因此医学(特别是印度的)虽然实践经验丰富,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生物学,特别是生化学。一种理性的化学,除了西方,其他任何地区都未见其踪影。

有着高度发达的史学的中国,却并不具备修昔底德的方法;即便像印度这样有着马基雅维里的前驱的国家,其政治思想都不缺乏可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相提并论的系统方法,而且也未形成较为客观的概念。无论是印度(弥曼差派)的预言,



修昔底德斯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体现了当时希腊哲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史学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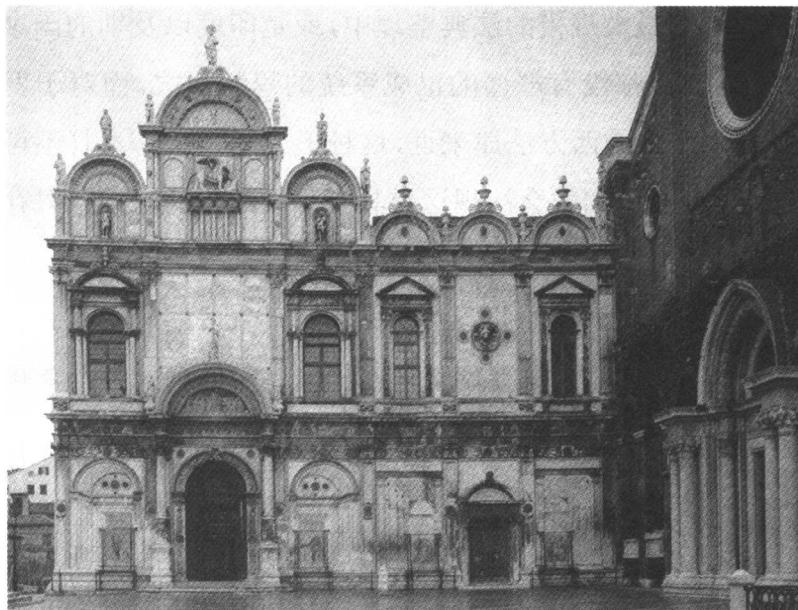


还是在近东最大规模的法典整理中，或是印度以及别的国家的法律著作中，都没有严谨的已成系统的思想形式，而对于罗马法以及衍生出的西方法律来说，这种形式却是最基本且不可或缺的东西。而诸如教会法规这类具有系统结构的法规也只存在于西方。

艺术领域也同样如此。别的民族对于音乐的感受能力或许比我们更为敏锐，绝非比我们略逊一筹。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存在着复调音乐；乐器的合奏和多声部的唱法也不仅仅为西方所有；我们现在那些所谓的合理音节，早已是世人皆知的；然而合理又和谐的音乐（多声部与和声也包括其中）、半音与等音（这里指的并不是五线谱上的符号，而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根据和声解释的那种）、以弦乐四重奏为核心的管弦乐、低音伴奏、记谱系统（它实现了现代音乐的谱写与演奏，并能够流传后世）、奏鸣曲、交响乐和歌剧，以及作为基本表现手段的风琴、钢琴、小提琴……，这一切的一切，都只为西方所特有，虽然标题音乐、音乐文学、全音和半音的结合早在传统音乐中就已经存在了。

在建筑领域，古代亚洲各地都一直沿用尖顶作为拱门的装饰；尖顶与横圆拱顶的组合，在东方也有所耳闻。不过，采用哥特式拱顶分散压力，覆盖所有空间的手段，并将其强化为建构雄浑建筑物的基本原则、并使之成为中世纪绘画与创造雕塑的一种风格，这在其他地方都是不多见的。但西方建筑学的技术也确实源于东方。

不过东方的建筑技术并未解决圆顶的问题，同时也没有那



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是欧洲建筑史上继哥特式建筑之后出现的一种建筑风格

种合乎一切艺术要求的经典意义的合理化类型(在绘画艺术中即是指合理利用线条与空间透视)——直至文艺复兴的出现。印刷术在中国古已有之；可单纯通过付印而成为一种印刷品(报纸与期刊即是)却是在西方出现的。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早已存在着各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而其中一些机构上的职能甚至可与现代的大学或学院相比；但是一种合理化、系统化、专门化的科学探索，以及对专业人员的培养职能，也只有在西方的教育中出现，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西方文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这首先表现在那些高素质的公务员身上，他们已成为西方国家的经济与生活的双重支柱。公务员已成为一种独特的类型——或许以前的人曾经畅想过这种情形，然而远未料到这类人会在社会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当然了，即便是高



素质的公务员，也是多彩社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西方国家比其他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更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一个国家的存在，其政治、经济的状况与发展完全依托于一个经过特殊训练与筛选的严密的系统组织；社会的运转与社会成员的生活步调，已为那些在商业上、技术上以及法律上受过严格训练的政府公务员所掌握。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阶级中，政治集团与社会集团的组织都是同样的系统。但西方意义上的“朕即国家”^[1]式的封建社会形式只为我们西方所特有。而由定期选举的议员组成的议会、由向议会负责的民众领袖、政党主席担任的部长所组成的政府尤其是我们独有的政体。但从把持政治权力、统治国家这种意义上讲，全世界都是同样的情形。事实上，倘若“国家”指的是一个拥有系统宪法与成文法律、并由一个受法律限制和约束、由高素质的公务员所管理的政治联合体，那么具备这些特质的国家也只存在于西方，当然，其他形式的政治体系也同样能够组成国家。

这也使“资本主义”——决定当代人生活命运的力量得以产生和发展。追逐金钱利益——这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种物欲只会存在于人类自身，侍从、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赌徒、乞丐……一切时代、一切国家的所有成员，无论有无实现这种欲望的可能性，这种欲望都存在。在文化史的学习过程中，人们从一开始就应该丢弃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对物质的欲望并不是资本主义，更勿论资本主义的精神。还不如说，资本主义在缓解甚至是抑制这种非理

性欲望的作用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些。但资本主义确实是通过持续的、合理的商业活动来产生利润并使利润再生——这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在一个具备成熟资本主义秩序的社会中，如果有哪一家企业不是积极利用各种机会赚取利润，那么它是注定会垮掉的。

让我们为“资本主义”做一个更为精炼的界定吧。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即是一种依赖于交换机制以谋取利润的行为，或者说是一种依赖于形式上的公平交易的行为。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际中通过暴力牟取利润，自有其法则，虽然人们会不自觉地将它与上述定义的行为放到一起做比较，实际上这样做并没有意义^[2]。只要资本主义形式下的获利行为是合理的，那么与之相关的行为总要根据成本来行事。也就是说交易要适合于这种方式，利用商品或劳务关系作为获利手段：当一个商业周期结束的时候，企业实际收获的货币资产，或是门下所有正在营业的企业资产的定期估算货币价值一定要超过资本，也就是交换中盈利的物质生产资料的估算价值。无论它是交付给旅行商人的定量成品，还是以厂房、机械、现金、原料，和用于抵偿的制成品或半成品构成的制造业企业，在这一点上都毫无二致。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是，以货币形式进行资本核算，在任何时代都体现着重要意义——不管是用现代的记账方法，还是用其他原始或粗野的方法。总而言之，收支问题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的：事业的起步要有起始收支；在作出任何决断之前要细细衡量一番，以确保“有利可图”；在任务完成时，要讨论收支估价，以确定利润的数额。举一个例子：一项克门达^[3]交



易的资产商定货币价值(在资产未以货币形式存在时)将由起始收支所决定,而最终的收支将形成一种估价,这也是进行利润与亏损分配的估价基础。为确保交易的合理性,交易的合作者将仔细核算每一个细节,尽管并不存在绝对精确的核算或者估价。以纯粹的方式进行,或者是沿袭原有便捷的方式进行交易——即便是在当代的社会,这种原则也仍然适用于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企业。然而,这只对资本主义获利方式合理的程度产生影响而已。

之所以要界定这一定义,主要是为了强调经济行为要符合收入与支出的比较,至于比较的方式,则没有什么限制。因而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即便已具备相当完善的资本主义核算制度——在现存的经济文献里,在我们已知的文明国家中都是存在着的,在四大文明古国、古代的地中海一带、中世纪以及近代都一直延续着。这种冒险事业并非是孤立的,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完善自身。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计较其他的因素,贸易并没有像现代这样的方式持续进行,而是表现为一连串独立的事业。大笔的商贸活动只是由某种特定的组织形成,像通过部门组织的形式。总而言之,资本主义企业与资本家古已有之,并且是全世界范围的。

但只有西方社会使之发扬光大。不仅数量可观,而且随着数量的增长,还产生了许多种形式和方向——这是在其他地区都未曾出现的。不可否认,世界各地一直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商人,像批发商和零售商,地域性商人和跨国商人;也一直存在着各种借

贷形式,为商业提供服务的银行同时存在着;航海借贷^[4]、克门达、交易以及与有限公司和无限公司^[5]相类似的联合体,甚至也成为了一项常见的商业形式;不管是什么时代,只要一直存在着公众团体的财源,贷款人就不会消亡。比如在巴比伦、希腊、印度、中国、罗马等国家,这些贷款人总在投资战争与海盗事业,并为各种合同与创新活动提供赞助;也正是这些人担任着殖民企业家。通过各种手段强迫奴隶劳动的种植园主的利益同样影响着对外政策的制订、占有土地租用权、行政机构,同时也是当地政府的税收大户;他们投资政党竞选,获取政治资本;为雇佣军队提供资金,从中牟利。总而言之,他们从来不会放过任何攫取金钱的投机活动,从不放过任何一次盈利机会。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存在着这种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除了投资、



名画《雅典学派》,画面中心人物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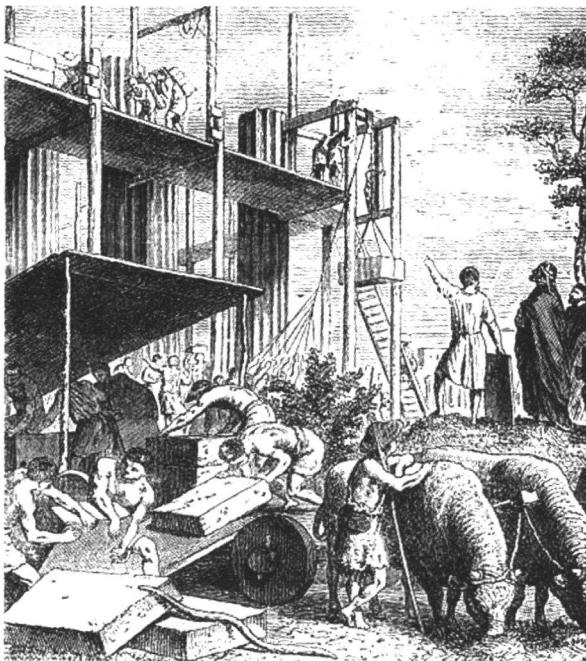


信贷、银行交易之外，他们的活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种投机倒把，或者趋向于凭借暴力以获取资本，特别体现在劫掠货品上——不管这种战利品是直接通过战争还是以长期劫掠附属国的财政收入的形式获取的。

无论是商业发家者、大型的投机商，还是特许经营权的猎取者，他们赖以积累财富的手段都是资本主义以及近代的、甚至是和平时期的金融资本主义（特别是热衷于发战争财的资本主义）。即便是现代西方社会，这种非理性的作为仍然存在；直到今天，大型的跨国贸易在一些方面仍像往时那样存在非理性的成分。

与此同时，近代的西方社会也发展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资本主义形式，即自由劳动的前提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尽管只是形式上的。在其他地方很少能够看到这种形式。虽然不自由的劳动组织形式也曾达到过相当合理的程度，但只是存在于单独的种植园内以及在古代奴隶社会的作坊中有着极其有限的表现。无论是封建贵族的采邑工场，还是强迫农奴劳作的家庭农场，这种合理性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发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除了西方，存在自由劳动力的家庭工业在其他地方是极个别的现象。通常在国家的垄断企业（这并不等同于现代的工业组织）中，大量的使用日间劳动者才会催生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可也没有产生我们中世纪就已存在的合理的学徒组织形式。

与固定的市场良好协调的工业组织才是合理的，而不是那些与政治挂钩、或盲目的投资赢利目的相适应；除此之外，西方



古罗马的奴隶作坊

资本主义还具备其他的特点。企业合理的现代组织形式如果没有其他两个重要条件的协作,将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两个条件就是:将事务与家庭分离;建立与事务密切相关的合理的记账方式;

前一个条件支配着现代的经济生活。实现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点的分离,这种形式也同样存在于其他地区,像东方社会的巴扎(即集市)和此种文化下产生的奴隶工场;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的发展和账本的使用在古代、远东及近东都存在着。但较之现代企业的独立,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这源于这种独立性存在的前提:即我们合理的商业记账式和法律上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界定分离——这是他们完全不曾经历过的,或者只是刚刚开始出现^[6]。在其他地方,曾存在使赢利企业成为皇室或具有家政性质的采邑业的一部分的趋势,正像罗德布特所观察到的那样,这种形式表面上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极其相似,实际上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甚至全然相反的发展历程。



西方资本主义所具有的这些特点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之间的紧密联系。即便是那些商业化、证券业的发展，投机的合理化，商品交换一类的活动都与之存在一定的联系，倘若没有这种合理的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所有这一切特点都不可能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特别是不会有与之结合而产生的现代西方社会结构。而精准的核算与谋划也只有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实现^[7]。

要不是现代西方的存在，人们根本无从知道合理的劳动组织形式，因而他们也根本无从知道合理的社会主义。尽管我们也不可否认，城市经济、食物供

给制度，君王的重商政策和福利制度，定额配给、经济生活管制、保护主义，以及自由贸易理论在诸如中国这样的国家中也同样存在着；各种面目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试验也很少进入人们的视野——无论是宗教的、家庭的还是军事的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垄断卡特尔或是消费者组织。虽然各个地方都保有着市民的商业特权、行会、公司，以及用各种形式的城乡法律差异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但除西方以外，“公民”这



罗德布特

一概念仍未出现在其他国家，“资产阶级”这一概念也同样如此。与此种情况相同，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同样不存在，因为这一阶级存在的前提是具有固定纪律约束的合理的劳动组织形式。可以这样说，在世界各地，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地主与农奴或佃农之间，贸易组织与消费者或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时无刻不在以各种方式存在着；然而西方早在中世纪就已存在的雇佣者与其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如今在其他地方却只是刚开了个头；而大资本家同自由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冲突在这些地方全然不曾出现过，因此也就根本谈不上诸如社会主义这样的现代问题。

从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使只从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活动发展的本身（在不同文化领域这种发展只有形式上的差别）也不是我们要注意的关键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以自由合理的劳动组织形式为特征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或者单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即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兴起与其特点的问题。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形式的起源与此问题密切相关，可两者并不是一回事。这是因为，作为一个阶级，早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态出现之前，资产阶级就已经存在了——尽管只存在于西半球。

从表面上看，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形态从始至终都受到科技发展可能性的影响。而其合理性实质上也依托于技术因素的质量，这也意味着其也依赖于数学和精准的物理实验为基础的现代自然科学。而从另一面来看，这些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从实际的经济应用中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而获益匪浅，但这些实惠



并不是西方科学起源的重要促成因素。发明十进位制计算的印度沿用着这种计算方法和代数知识，然而这种古老的算术只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得到了发展与应用，成为现代算术与簿记法，而其发明国却并没有将它发扬光大。虽然资本主义的利益驱动并不是数学与机械学产生的根本动因，但实际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则的确需要通过经济方面的考虑，而这种观念也确实促进了西方科技的发展与应用，并且是从西方所特有的社会结构中衍生出来的。那么，人们或许要发出这样的疑问：在这种西方特有的社会结构中，并非所有的因素都同等重要，那么这一促进作用又源于哪些因素呢？

毫无疑问，法律与行政机关的合理建构是这些发挥促进作用的因素中至关重要的两点。发展近代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支持，完善的法律体系与高效率的照章办事的行政机构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这项因素的管理与调节，虽然也会存在投机性质的资本主义及各种受到政治因素制约的资本主义，然而却绝不可能产生私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产和财务审核制度的合理企业。这种法律体制与高效能的行政机关只在西方社会才处于一种相对完善的状态，且一直促进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那么，基于什么样的条件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合理的法律体系呢？和其他情况一样，资本主义的利益与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司法阶级的利益并不冲突，后者可以借助前者的力量在法律与行政机关中取得统治地位，但并非是促成的主要因素。因为法律并不是源于这些利益本身，来自各个方向力量的合力促成了这一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但在印度和中国，